

· 一百年与二十年：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十九） ·

# AI时代：书写的无限开放与文字的重构

陈晓明

**【内容摘要】** 基于文明演进与书写技术变迁的宏观框架，AI时代标志着人类进入“智能文明”阶段，书写行为正经历根本性重构。AI的介入将带来书写的八大变革趋势：写作主权从人类向人工智能让渡并形成共享关系；创作的主体性与个性化风格因技术的“平均化”逻辑而趋于弱化；主要对话语境从人际转向人机；个人书写的权威性面临消解；以个人经典化为标识的文学史叙事可能终结；新的学术范式因信息均质化而难以生成；文艺作品将转化为智能产品；写作与阅读行为本身则趋于仪式化。人工智能写作依托海量语料与强大算力，能高效产出文本，但也可能导致思想深度、艺术独特性与生命经验浓度的稀释，最终将重塑文学的本质属性与文化生产生态。

**【关键词】** 人工智能 语言文字 写作主权 智能文明

**【作者】**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 100091）

今天我们面临 AI 时代到来的挑战，几项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推进人类的生产力方面正在起到重要的作用，其作用目前还无法估量，几乎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显然，它对人类生活的挑战并不只限于此，无疑将引起人类生活更深层次的变化。AI 对当今写作的影响，不只在它提供了某种便捷的工具，还在于它将深刻改变人类写作的规则、文学创作的规则，甚至改写文学的原生本质，改变文学研究的根本规则。所有这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并非几句话可以概括完全，或许可以从写作和文字的角度，来审视 AI 介入之后将会引起的文学、文化、人文学的变化，从而来理解更遥远的社会和文明的变化，这可能可以使我们以更高的站位看到未来的远景。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把人类历史开端的时间节点确定为距今 30 万年前的某个时刻。<sup>①</sup>汤因比认为人类与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具有意识和意志，人类历史的诞生应以意识的觉醒为标志，他认为大约在 30 万年前人类的意识开始觉醒。判定人类的文明时代则以这几个标识为依据：(1) 城市聚集的出现；(2) 文字的发明与使用；(3) 金属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早期是青铜器（或金属器）的使用；(4) 复杂的礼仪与宗教体系；(5) 表现为大型祭祀遗址、礼器、

① 参见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王皖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墓葬等的等级分化，反映出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和权力的合法化。显然，在所有这些社会化的建构中，人类拥有语言和文字是最为主要的动力，只有发达的语言文字才可以促使其他体系建立起来，并发生作用延续下去。因此，人类文明最核心的要素是语言文字，它是人类文明的黏合剂，又是血液和动力源泉。如果把文明的其他物理性和社会性的形态看成人类的实体性存在的话，那么，语言文字则是人类的灵魂，它反映了人类的意识和意志亦即人类的思维、想象和感觉所达到的复杂程度。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人类的书写经历了多次深刻的变化，从口传文明到书写文明，这是近五六千年的事情。我们现在讨论的 AI 时代到来后的书写改变，在狭义上可以看成书写工具的改变。尽管还是人在发出指令，但形成文字和特定文体内容是由 AI 协同完成的。人借助 AI 完成了此项书写行动，共同创作了某个文字作品。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其结果无法预料。但实际上，人类文字的书写工具与方式发生了多次变化，本质是“载体与工具的协同进化”，整体呈现从“坚硬笨重”到“轻便高效”、从“专属特权”到“大众普及”的趋势。古代早期，人类以刻写与涂写的方式开始书写，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500 年。此一阶段的核心是“以硬刻软”或“以软涂硬”，书写工具与载体均较为原始，书写门槛极高。两河流域与古埃及人民就开始使用削尖的芦苇秆或木棍，在湿黏土板（两河流域）或莎草纸（古埃及）上刻写或涂写。其代表是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书写需专门学习，多为祭司、官员掌握。现在可考的古代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被刻写在泥板上，距今有 6000 多年的历史，只是此说似还有争议。中国先秦时期的主要文字工具为刻刀和毛笔。刻刀用于在龟甲、兽骨（甲骨文）和青铜器（金文）上刻字；毛笔配合墨，用于在竹简、木牍或丝帛上书写，后者已具备“笔墨纸”的雏形。古希腊与古罗马人在初期阶段用铁笔在蜡版上刻写，后期逐渐使用羽毛笔蘸墨在羊皮纸（由动物皮制成）上书写，羊皮纸成本高昂，仅限贵族和教会使用。

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推进了人类书写文明的发展，印刷术的发明史是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技术迭代史。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源地，该技术后来传播至世界各地。15 世纪，德国工匠古腾堡结合金属工艺，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术，促成了欧洲的“印刷革命”。现代印刷术加速了知识传播，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对于中国来说，印刷术也是推进中国进入现代的重要动力之一，现代思想和文化的传播依赖印刷业和媒体的发达，现代印刷术促成书写工具的改变，它使书写可以更大范围传播，更迅速影响社会。反过来它也使书写者得以接受更多的资讯，使书写建立在更为广泛的书籍和资讯基础上。

如此看来，人类文明可以按语言文字对人类的意识和意志所起到的能效（决定方式）来作出长时段的划分：第 I 期，前语言时期；第 II 期，产生语言的口传文明时期；第 III 期，产生文字的书写文明时期。如今，我们正面临着人类借助 AI 进行书写并开展社会活动的挑战，人类的语言和文字在 AI 助力下，产生几何级数的飞跃，可以称之为第 IV 期，即智能文明时期。

人类的口传文明大约存在 5 万年，书写文明大约存在 5000 年，智能文明现在刚刚开始，其前景不可限量。显然，我们难以想象从现在的智能文明起步阶段开始，再过 5000 年、5 万年、50 万年，人类文明将会是什么形态，将会达到什么样的文明程度。贫乏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同样，忧患也不应该带偏我们对 AI 时代到来的认知，尤其是不应对当前 AI 介入人类写作和社会交流作出过于悲观的评价。作为以写作为生，以自觉的冥思苦想为志业的人文学者，我们也不应该对 AI 介入写作采取轻视的态度。我们要看到，现在的 AI 刚起步，不过一个牙牙学语的幼童，已有着如此强大的能力，那么，它未来的能力会有多强，它对我们的控制力和支配力又会有多强？我们

当前在形而上学层面作出的思辨推论，原则上说是文不对题的，AI的算力推理和智能生成的逻辑，与人类的思维根本不同，其基本逻辑模型也不同。尽管它来自人类的编程，来自人类的指令，但它形成的机制已经远超我们人类的逻辑和思维所能抵达的程度。

我以为，与其去表达我们人类的忧虑，表达来自传统书写的自信，不如去设想一下，AI介入我们的写作究竟可能发生一些什么变化。目前我们还只能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范畴里来讨论AI对人类写作产生的影响，或称之为引起的变化，这种讨论方式或许过不了多久就会失效，但目前我们只能做所能做的事情。我以为有以下八个方面的变化是可以考虑到的。

### 人让渡写作主权，与AI构建写作主权共享关系

未来，人的创作权或作为人署名的写作权将部分地让渡给AI，直至全盘性让渡。2025年1月20日，DeepSeek-R1发布推理模型，性能比肩OpenAI o1，极低的成本，极高的效能，这使中国的智能科技震惊世界，甚至引发华尔街股市巨幅震荡。如此突然的震动，让国人一时无比振奋，尤其是文人墨客也不得不警觉起来，对AI模型投以专注的神情。过去，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人文专业的研究者都有一种自信，那就是AI是无主权的写作，写作是人的特权，AI只能充当写作者的工具。然而，在人无法离开AI进行写作的趋势下，人的写作会越来越信赖AI，其结果必然是人把写作主权让渡给AI，或至少是与之分享写作主权。不可否认，人的写作主权处于被迫让渡的趋势中，理想的状况是两者构建共享关系。

在中国传统社会，人的写作主权具有一套特别的维护机制，即维护“圣人写作”，它通过对圣人写作和权威谱系的维护建构起来。孔子曾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尊崇“三代之学”，因此，“六经”是圣贤之书（后来演变为“十三经”），中国古代崇尚读圣贤之书，建构了一套学术/知识规章。甚至孔子都认为自己不能随意创作，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转述圣人之言，代圣人行言，实际上有他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诸子之学也是对圣人之学的一种运用转述。从三代之学到诸子之学，维护了圣人之言的崇高传统，可以称之为中国的伟大传统。注疏经学成为文人学子的为学本分，在金耀基看来，中国传统哲学的时代可以称为“解经时代”。<sup>①</sup>显然，金耀基是受冯友兰的影响，冯友兰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在《中国哲学史》中，他将自孔子至淮南王时期确定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时期则为经学时代。这两大时代转化的标志是董仲舒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以实施，随之公羊学的官学地位得以确立。<sup>②</sup>公羊学本可以开出“外王”的向度，然而，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文人为学做的无不是注经之学，直至晚清章太炎在品评三百年中国学术时，仍然遵循解经之学的脉络。在所有注经之学中，乾嘉学派是一个高峰，在这个高峰中，章太炎注重以小学评价前人的学术水平。章氏尤重音韵学，把注疏学最后落实到文字学，着根在音韵。他认为这才是真功夫真学问，他用这个标准来评价清代学人，针砭时弊。<sup>③</sup>不知索绪尔和德里达两位若是读得懂章太炎，他们会作何言说并与之作出何种对话？

西方也有一套写作制度。在柏拉图记录的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录基础上，后人将之编辑为《柏拉图对话录》，深刻影响了后世。西方的学术谱系与中国有很大不同，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有各种各样的论述，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圣奥古斯，虽都与柏拉图有关系，但他们的论说属于宗教哲学，再到现代的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法国、英国的哲学家，各自都成就了许多重要学说，各立门户，自成一家，蔚为大观。西方的这种学术发展确实形成了一种探究世界终极本

① 参见《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秦晓编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该书第二部分收入金耀基先生的论文《现代性转型与转型社会》。2009年4月25日，由《读书》杂志和博源基金会在北京召开了“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研讨会”，围绕秦晓的《中国现代性求解》一文所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问题进行讨论，金耀基先生在会上作了“现代性转型与转型社会”为主题的演讲，阐述了传统中国的“经学时代”，笔者当时在现场聆听了金先生的宏论，并参与讨论。

② 参见曹顺庆、王庆：《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奥秘：“依经立义”》，《中州学刊》2012年第5期；许家星：《现代哲学视域下的经学——以冯友兰为中心》，《中州学刊》2020年第12期。

③ 参见章太炎、刘师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徐亮工编校，罗志田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质和外部世界无限可能性的学术体系，它有自己的科学脉络，在人文学方面，也确实形成了哲学和宗教的内在关系。当然，西方不管是人文学还是文学艺术，都建构起了人的写作主权，拥有庞大的面对世界的认知体系，这与中国维护圣人之言的传统不同。中国进入现代后发展变化非常大，面对西方的挑战，兴起了各种学说。

十月革命的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开始形成，并开创了自己的道路，当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与西方各种现代学说进行对话，展开了非常丰富的讨论，在马克思主义观念指导下初步形成丰富多样的中国现代学术谱系。人文学的话语体系毫无疑问是在坚定创造人的写作主权，以人为中心建构写作特权，只有人才能拥有写作能力和解释世界的能力。目前出现的人工智能实际上是机器在起作用，虽然是人在编码，但是两者形成的机制完全不同。AI是由算力和计算机语言建立的逻辑模型，通过自身的推理、运算形成概念、范畴、语法，并建立一套学术体系。显然，这种机器叙述非常强大，它运用了海量的由人建构的数据库，是在人的写作资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使用的是人的语料，但是处理能力非常强大，如同一个超级大脑。随着AI掌控的人的语料资源越来越丰富，其能力也越来越强大，逻辑推理能力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因此，人越来越需要借助AI写作，从借助到依赖，再到让渡主权，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过程，由此人的写作将面向无限开放。

### 写作主体性与个性风格的弱化

主权让渡的根本在于主体性的弱化，再也没有纯粹个人的自主、灵感式的和任性的创作，这是就文艺创作来说的。过去文艺创作被理解为只有少数人勤学苦练、日积月累才能有所成就。甚至人的写作被认为源于灵感，只有少数天才式的作家才能够创作出伟大作品。在中国，诗歌和文章写作非常注重个性，唐诗宋词中可以看到个人鲜明的风格。唐诗分为初唐、盛唐、晚唐诗，这实则是在各个时期诗人的风格化表现为标识来进行概括的文学史叙事；甚至在李杜之间辨析他们的风格差异也构成诗学史上经久不衰的课题。宋诗虽然无法比肩唐诗，然而宋词兴起，却也是另一派景象，比如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豪放派，辛弃疾代表的苍凉悲壮风格，婉约派也有它的一席之地。

写作的个性化风格的强化在于标榜了写作的主体性，而主体性依靠各种鲜明的风格来确立。在中国当代写作中，莫言通过独特的语言、语法风格来表现他的构思，以及他对世界和人性的理解，这种理解涵盖了许多方面。有个性的作家通常非常任性，莫言在《生死疲劳》中，敢于让猪说一大堆话，而且越说越离谱。毕飞宇的小说《推拿》描写了一位盲人推拿师小马，他暗恋同事王大夫的女朋友小孔，小马将小孔（嫂子）想象成一匹有棕色鬃毛的马，想象有一个牧马人拿马鞍骑在她的身上奔驰而去。他想象的这些情景是他意识到的内心痛苦的浪漫化表现。从这些想象都可以看出毕飞宇小说叙述的超常能力。贾平凹的小说曾表现过空灵美学，《废都》无疑是写得很空灵的作品，但他后来放弃了这种风格，转向沉郁一路，如《秦腔》《古炉》《山本》《老生》等。现在AI介入写作，智能写作在综合各种语料库的基础上，也能创造出非常精彩漂亮的文本，但AI今后是否能模仿某位大师创作出作品？比如模仿莫言，或者莫言给予指令请AI模仿他的风格创作一部作品，我想AI今后很可能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不管如何，这是模仿之作，是致敬式的写作，它无论如何都不是个人的、生命体的风格化写作。

现在 AI 刚起步,许多人都认为 AI 写作永远无法呈现人的个性和写作风格中的微妙之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下面两点。其一,风格化今后会很重要吗?我们真的会因为风格化而喜欢上一位作家吗?事实往往相反,我们是因为欣赏某部作品,认可这位作家,才接受了他的风格,看似作家是因为风格化的力量征服了我们,实则是我们在接受过程中倒置了两者。其二,不能忽略一点,人们实际上很容易盲从,辨别力也非常有限,只有极少部分人能辨别出最优秀的作品、作家、学者。同样的辨析在科技领域或许更容易做到,因为许多创造和发明能够通过量化来判断,然而这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在人文科学方面却非常困难,其中的偏见还来自帮派之争、门户之见和立场之争。这些都是人文学科的个性化所致。在自然科学方面,这种个性化体现在科学发明、发现和创造上,它们甚至可以用公式表达出来。AI 写作可以轻松抹平人文学科的个性风格和写作的主体性差异,因为超常的内容很快就会被抹去,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鉴别出来。AI 只取了大多数人的平均值,而极少数人的见解会被忽略。久而久之,这极少数就失效、失踪和消逝了。

在过去,孔子维护圣人之言如此谨慎,他认为圣人之言的真理性 and 纯粹性非常宝贵,无法超越,也不能被遮蔽。中国后世也尊崇孔子,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维护孔子代表的儒家正统,但这可能完全违背了孔子的初心。在现代社会,即使并不一定是“黄钟毁弃”,但“瓦釜齐鸣”足以盖过“黄钟大吕”的声音,尤其是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时代,更不用说 AI 写作将要格式化“黄钟大吕”,AI 写作本质上就是“瓦釜齐鸣”。

个性和超常不再重要,而是取平均数,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现代文化和学术民主导致的结果。大家都分享了一种平均数,大家都是做 AI 的公分母,都被通约了。因此这种取一个公约数的 AI 时代可能不再需要超常的见解,因为在 AI 时代或者智能文明时代,其逻辑依据是大数据,再大的 1 还是 1,能被通用和通约的才有价值,而独特的观点或极端、深刻和超常的见解无用且无效,再也没有“真理在少数人手中”这种可能性了。在传统社会,例如西方,一些学说被视为异端,布鲁诺的历史遭遇很能说明这一点。因此,我们今天不要认为 AI 没有个性和写作主体性,人类创造知识的独特方式就无法被取代,我认为这类说法经不住推敲,并且终将在时间检验中被击败。AI 写作最终会通行无阻,在信息化社会和互联网搜索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存在。尽管我对此感到悲伤,但也只能向隅而泣,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搜索引擎盛行的时代已经开始趋向大数据,最近十几年人文学术的研究已经开始了资料化通约——虽然有一个好听的词“历史化”,或许也是。我们回顾 30 年前的书籍和作品,还有多少可以留下,今天的文章和论文能独领风骚三五年已算长的了,很快就被通约了,这点很可悲。个性化的文学语言、方言土语也将被最大限度格式化,语言变成标准的通约语言。从语言表达来看,AI 写作的语言目前还有些刻板,虽然表意准确,但是缺乏个人化写作中那种微妙的表现力,尤其是缺乏作家、诗人那种语言创造性表达的意外惊奇。人类作家在写作时,会根据不同的语境和表达需求,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方言俗语、网络流行语等,使语言充满活力和个性,AI 写作目前还很难达到这样的程度,但是,二三十年后无疑会有质的变化。

### 人的对话语境转向人机对话语境

在 AI 介入写作的时代,人的对话语境开始转向人机对话语境,转化为 AI 智能模型的自我训练。过去我们的写作是作家、诗人写给读者,或者是作家写给所有人类的,其叙述的本质是人与



人对话；人文学科的研究也首先是学者之间的对话，在人文学这个知识体系里对话，再转向更多的人，转向影响社会。一旦它们成为 AI 智能模型的训练之后，对话的双方就发生了改变，它们被智能化重构了。在过去的文艺创作中，作家需要阅读许多经典作品，阅读经典作品也是和大师对话。马尔克斯声称他读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读了五十遍，他坦言从《佩德罗·巴拉莫》中“找到了继续写书而需寻找的道路”。《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与《佩德罗·巴拉莫》中的那句颇为相像——“雷德里亚神父很多年后将会回忆起那个夜晚的情景。在那天夜里，硬邦邦的床使他难以入睡，迫使他走出家门。米盖尔·巴拉莫就是在那晚死去的”。这两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是受后者启迪的结果。同样，莫言也是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读了《百年孤独》，他说读了二十几页就不敢再读下去了。他的《红高粱》的开头也让人想起《百年孤独》的开头。这些阅读和写作，都是大师之间的对话，体现了名作之间的亲缘关系、借鉴和启示关系，表明了伟大作品相互成就的文学史原理。

传统写作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写万行诗。在传统社会中，创作都是处在人与人的对话语境中，因此才会感动人。写作首先是人的写作，我们经常说知人论世，比如了解鲁迅一生的经历，我们才能理解他的作品以及他为什么这么写。鲁迅当年就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之七》）文学是一种生活，文学本身是一种故事，每一个作家都有故事，因此，不仅作家、诗人以及人文学者的传记非常有魅力，中国现代的作家和学术前驱们的著述也非常有时代的感召力。梁启超、章太炎、鲁迅等的学说让我们赞叹，也是因为他们历经了整个现代的社会，是急剧变革时代的见证人。过去我们阅读和倾听人的心声，用心灵感应另一个人的心灵，而 AI 写作时代，语言是机器生产出来的，它模仿了人类，但无法沾染上人的生命气息。

## 个人写作的权威性面对 AI 的严峻挑战

个人书写的权威性失落将会是未来书写的趋势，不再有伟大作家、伟大诗人，也不再有学术大师或卓越学者，只有比拼算力的 AI 大模型。学术权威性或超人见解被算力的平均化统计、归纳所代替，智能时代的书写不再有个人的超常发挥。过去的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都是由少数极具创造力的个人完成，这样的历史可能行将终结。虽然孔子的《论语》“述而不作”，转述圣人之言，但是他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如此多的学生追随他，这说明他的学养、道德和名望被圣化，因此，孔子成为万世师表，树立了他的个人权威。后世儒学都是在孔子的影响下回到注解六经，回到孔子的价值立场和他看待事物的体系中，不同时代出现了不同的大师和天才人物。道家哲学也同样如此，王弼 21 岁注老子《道德经》，天分极高；王勃在二十多岁时写《滕王阁序》，赋中不仅有描写自然景色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有很多人生感悟，如“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他对人生的感悟几乎让今天六七十岁的人感叹不已，他当场挥笔写下《滕王阁序》，这是古典时代人的才华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在古典时代的中国，几乎每一个作家的个性化表达和诗意化的表达都融入了他个人的感怀身世。这种个人性不仅在于他的作品好，而更在于围绕着

他的作品、他的写作本身可以建构出一个非常丰富的感人的文学故事。中国传统文人多有类似李商隐怀才不遇的境遇，李商隐有诗句：“寒梅最堪恨，常作去年花。”梅花的傲骨经常被歌颂，但在这里他却写出了一生的悔恨：感伤人生总是错过机会，就像梅花确有傲骨，但又如何呢？这种个人书写总是与丰富且具有历史感的叙事相缠绕。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曾经讲述过一个故事，尹文端公三十岁担任江南总督，去看望年已七旬早已失意的老诗人杨守知。杨老甚喜，自指其鬓叹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年轻的尹总督回答说：“不然！君独不闻，‘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乎？”<sup>①</sup>两人的应答都取自李商隐的诗。显然，在这样的场合，因为李商隐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经典化地位，引述他的诗句使这场对话具有深远的文化含量。

个人写作的经典化和权威化在中西传统中都是如此。西方柏拉图之后的传统无论是思想史还是艺术史中都出现了不少大师。哈罗德·布鲁姆在1994年出版了《西方正典》，重新树立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文学经典传统，认为莎士比亚乃是其后的所有西方作家的父亲，甚至包括俄罗斯的托尔斯泰都在其中。这些后世作家都需要与莎士比亚进行一番决斗才能够心中踏实。托尔斯泰一生贬低莎士比亚，虽然他声称看不起莎士比亚，但是他晚年还是写出了一部名为《哈吉·穆拉特》的中长篇小说，与莎士比亚较量。这部作品并未完成，托尔斯泰在晚年反复修改此作，并嘱咐要用这部作品作为他的枕棺之作。在布鲁姆的理论演绎中，莎士比亚的权威性被推崇到了极高的位置。

在AI智能时代，我不知道人们将会如何处理与AI共同完成的作品，如何把它经典化和权威化，如何指认哪个程序创造了某篇/部作品？本雅明当年讨论的是机械复制时代的文明和艺术，如今我们进入了AI智能复制时代——变化无穷无尽、日新月异、没有止境，直到机毁人亡。过去我们经常说穷尽毕生精力，AI可没有毕生，它将生生不息——也可能会有终结，那将是AI的自我终结。计算机的算力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达到顶点，但显然我们现在无法想象。

## 以个人写作经典化为标识的文学史以及文化史将消亡

学术史和文学史都在不断向权威和大师挑战，如此才有进步和创新。我曾用“晚生代”描述过中国先锋派及其后的作家群体。这一代中国作家实际上非常卓越。早年我与他们多次交谈，他们都沉浸在对文学大师的阅读愉悦、敬仰和向往之中。他们中的多人曾经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向我感叹过大师的可怕，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和北村的交谈中，那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30出头，北村才20多岁，他说“大师太可怕了”，我原以为这些初生牛犊不怕虎或者会自以为是，然而却不是这样。这次对话促使我后来用“晚生代”这个术语去表述这代作家，我体会到他们在面对文学史上的大师时的那一种“晚生感”，而面对知青那一代作家，他们更有一种历史的“晚生感”。1991年，我在《文学评论》是年第5期发表了《最后的仪式：“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这篇文章，开始用“晚生代”这个概念来描写先锋派同时期的作家群。我认为恰恰是由于过去的文学史由许多大师构成，对大师的挑战和反抗成就了后世每一个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西方作家都要与莎士比亚较量，以此成就自己的这种模式在中国也存在，例如莫言与马尔克斯、略萨、福克纳、鲁迅、蒲松龄等前辈作家的较量。莫言深受民间戏曲的影响。中国古典戏曲多是由文人或表演者加工而成的民间作品，没有明确作者，但它有庞大的资源库，具有强大的增补谱系，不断被后世改写，所以中国民间戏曲也具有史诗性的特点，不断被丰富、修改和经典化，并长期口头流传。而莫言的作品能在艺术品质上呈现历史的纵深感也与此相关。

<sup>①</sup> 参见袁枚：《随园诗话》，孙红颖解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6年，第7页。



在 AI 介入写作的时代，以个人为标识的文学史谱系可能发生根本改变。我们看此前的历史，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不用说，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也基本形成了文学史叙事，大量作家被作为文学史的标识性存在，其作品标志了中国当代文学达到的艺术高度。不管是用赵树理、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的谱系来标识中国当代文学史，还是用莫言、张炜、余华、苏童、毕飞宇、格非、麦家、阿来等的谱系来标识中国当代文学的气象，都少不了人物和作品。也正因此，文学的多样化才得以显现。但是，AI 时代的文学景观将如何呈现呢？

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中国年轻一代作家的日子逐渐不好过了，他们的创作被 AI 介入，不再是个人冥思苦想、痛苦不堪、拼命写作的过程。我知道余华当年在创作一部作品时非常用力，称之为呕心沥血都不为过。麦家写《人间信》，写到动情处会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中国其他作家都有类似情况，林白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曾表示，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就死了一次。显然，今后或许不再有这样的写作了，只要依靠 AI 的助力，写作就会变得很快活、容易、舒服，不用再死一回。路翎 18 岁时（1940 年 5 月）着手创作《财主底孩子》，1941 年 2 月完成初稿交给胡风。不幸的是，胡风从重庆疏散到香港后，丢失了该初稿。于是，路翎在 1942 年不得不重新写作，并于 1943 年 11 月完成了重写的第一部，此时他将书名改为《财主底儿女们》，第二部则完成于 1944 年 5 月。历史上不少作家因为写作作品历经磨难，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回想在战火纷飞和动乱的年代，路翎丢失一部长篇小说的稿子是多么痛苦，后来回忆重写这个作品时，他又是以怎样的精神和心情书写。作家不得不把他的生命投入创作，于是才有文学，才有伟大作品。这种个人的生命投入在 AI 时代可能消失，我们应该痛心还是庆幸？

### 学术新概念和新范式将无力生成

AI 的算力是无限信息的均衡综合或者平均综合，所有的思想资源或者语料资源都获得了同等的存在概率，无限多信息重复叠加，无限量变。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提出“范式”革命的理论，即新范式产生于大量解难题活动，例如，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等人，以不同方式提出了量子力学的理论，解开了经典物理学无法解释的难题，形成了量子力学（或量子物理学）的理论范式。

在文学研究或文学理论创新方面也同样如此，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范式的改变实际上非常缓慢，从现代到后现代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这可能不仅是一个大的范式的改变，中间还有许多小的阶段性变革，或提出了一些新的范畴，累积到一定程度，话语体系就发生了变化。

AI 写作（包括创作和理论）每天都在解决难题，它不知疲倦地运用现有的语料库或词汇库，在运算中选择、推理，提出某种新的见解，又会迅速被其他的语料所覆盖，因此没有办法累积到非要变革不可的程度。AI 需要解决的是技术上的算力瓶颈问题，无法捕捉学术话语的瓶颈，那么，未来是由人给它指令，还是会出现超级学术大师能够概括、发现还有哪些重要的难题需要突破？我认为这种局面很难形成，AI 今后会改变话语传播和运行的方式。因此在人工智能全面深度介入写作的时代，文字被智能化写作的逻辑支配，文化学术思想生成方式已经改变。我无法预料、展望未来学术范式的构成、突破、转变及其具体方式，我只知道新范式的产生不是不可能，而是会被覆盖，变化太快，以至于时间都变成共时性的或共生性的。

## 文艺作品转化为智能产品

即使是由人给予简单的指令完成的 AI 作品，也可以标上文艺作品的标签，这没有任何问题，除非有特别的立法。传统文艺作品是由署名的个人创造的，凝聚个人的才智和情感，个人的才智和思想因此对社会历史产生影响。我们对人性、生命的理解可以包含在 AI 写作的作品中，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它？其本质上由机器（计算机）生产，是个人借助机器来完成的。AI 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人越来越依赖机器，最后可能失去写作 / 创作能力。随着人写作能力的退化，著作权会让位给 AI，因此，未来的作品只能称之为产品。

受过普通教育的人都可以直接给 AI 下指令，而后产出一部作品，未来是否还需要图书市场呢？无纸化的电子图书可能会成为主流。通过 AI 生产各种类型的作品甚至高质量的文艺作品，这完全有可能。智能算力在日新月异地进步，时间被无限制压缩，我们过去需要 10 年或者 100 年完成的任务，现在可能两年就能完成，而我们过去需要两年完成的任务，现在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几分钟就能完成。文学作品转化为智能产品，以满足人类的情感、快感需求。文艺作品是需要让人感动的，我不确定这一点是否会发生变化，但人类可能会更愉悦，因为今后选择的余地会非常大，好作品可能层出不穷。然而，量的无限扩大和产出的便捷使得经典化可能不再构成问题，一切都是临时性的，一切都变成了暂时的，可替换的是量的无限丰富，但它既是丰富的，又是超量的、剩余的，今天我们确实要“守望剩余的文学性”了。<sup>①</sup>

## 写作发表和阅读具有仪式性

在 AI 介入乃至统领写作的时代，写作发表和阅读将为 AI 所支配，人的写作能够参与其中，但成为一项对写作的留恋、纪念和哀悼的仪式。写作将要让渡给 AI，人只是一个辅助，虽然人仍然需要阅读，但是文字阅读将大大让位于视听。“智能文明”的另一面是“视听文明”，我曾考虑过以“口传文明”“书写文明”到“视听文明”的变迁来描述人类文明的演化过程，揭示今天文化发生的根本改变。<sup>②</sup>今后文字阅读可能变成仪式性或者奢侈性的工作，成为一种对人类曾经有过的行为和生活的怀念，我们对之顶礼膜拜就像我们今天举行一项庆典或者仪式一样。而视听则让人直接面对声音和物象，仿佛回到了我们和世界的原初关系中。

或许书写文明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是一个过渡阶段。我们走进大自然，观察眼前的事物，视网膜反映外部世界。视听文明给我们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们不再需要文字阅读。阅读文字显然更累，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漫长的教育，但文字通过想象转换，实际上极大地训练了人的思维，促使人类成为现代人并建立高级文明。曾经有学者说，“自从电影发明以来，人类的经验提升了五倍”，文字发明对于人类的意义可能更大。而看似非常高级的视听文明仿佛是转了一圈，回到了原初的甚至是原始的文明中，那时我们就置身于自然，直接面对着声音和物象，“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我似乎有点悲观，事实上，在动笔时，我是试图保持乐观的，甚至想表达憧憬和展望，何以最后会有些气馁呢？可能还是我的认识有局限性，我的想象有限，我的情感脆弱。但理智告诉我，我们应该既怀着期待又有所警觉，相信人类的未来会更美好，AI 文明的时代人类会生活得更好。

编辑 屠毅力

① 笔者在 1997 年出版了《剩余的想象》，2013 年，又出版了《守望剩余的文学性》。多年后，没想到一语成谶。

② 参见陈晓明：《视听文明时代的到来——新的美学与感知世界的新方式》，《文艺研究》2015 年第 6 期。